

辽宁省考古学文献

1949—1985

第一辑 旧石器时代

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

1986. 8. 沈阳

211

54

目 录

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1)
辽宁省博物馆十年来的考古工作简介·····	沈 文 (15)
建国以来朝阳地区考古收获·····	邓宝学 (19)
1979年朝阳地区文物普查发掘的主要收获·····	省文物普查训练班 (24)
辽宁建昌普查中发现的重要文物·····	冯永谦 邓宝学 (27)
沈阳地区考古发现记略·····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 刘 伟 (31)
综述旅大市近年来考古新发现·····	旅顺博物馆 刘俊勇 (33)
东北考古的主要收获·····	王承礼 张忠培等 (35)
东北历史和考古中的几个问题·····	佟柱臣 (42)
辽宁大地的原始居民·····	郭大顺 (56)
历史悠久的辽宁·····	王绵厚 (59)
辽宁旧石器考古的展望·····	
在辽宁省文化局和省博物馆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的发言·····	贾三坡 (62)
东北地区的旧石器时代考古文化·····	匡 瑜 (65)
辽宁旧石器时代文化概述·····	付仁义 (73)
辽宁营口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 (77)
辽宁营口金牛山发现的第四纪哺乳动物群及其意义·····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 (84)
对营口金牛山A点一九七八年新发现的探讨·····	崔德文 (93)

金牛山猿人化石发现侧记——北京大学考古系·····	黄蕴平 (95)
本溪山城子庙后山旧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78—80年发掘的综合研究	
(提要) ·····	庙后山联合发掘队 (98)
庙后山遗址在我国旧石器时代考古中的地位·····	陈德辉 付仁义 (102)
辽宁本溪晚更新世洞穴堆积·····	黄学诗 宗冠福 (104)
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	鸽子洞发掘队 (109)
鸽子洞·····	辽宁喀左县文化馆 (123)
辽宁建平人类上臂骨化石·····	吴汝康 (125)
辽宁建平及康平几种更新世晚期哺乳类化石·····	周明镇 薛祥熙 (126)
辽宁海城小孤山遗址发掘简报·····	张镇洪 付仁义等 (129)
海城县发现旧石器晚期洞穴遗址——鞍山市文化局·····	张喜荣 王晓宾 (136)
凌源西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	辽宁省博物馆 (137)
前阳洞穴遗址发掘简报·····	王连春 崔双来 (140)
辽宁丹东地区旧石器时代末期人类化石的新发现·····	林一璞 张镇洪等 (146)
辽阳安平化石哺乳动物群的发现·····	张镇洪 邹宝库等 (151)
辽宁地区远古人类及其文化的初步研究·····	张镇洪 (159)
人类历史黎明时期的辽宁·····	刘凤翥 (167)
北黄海披毛犀和猛犸象化石的新发现·····	张镇洪 (170)
摘录·····	有关辽宁旧石器文化的部分文摘 (172)

第一编、综 述

概述辽宁省考古新收获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

辽宁地处祖国东北，历来是中原与东北往来的必经之路和中原文化与我国东北各族文化的接触地带。

辽宁是我国近代考古开始较早的地区之一，但在旧中国，这里的文物古迹遭帝国主义劫掠，历史文化面貌被歪曲。解放后，这种状态迅速改变。随着文物保护工作的加强，考古调查、发掘逐年扩大，从石器时代到明清各个时期都有新的发现，为研究我国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历史文化的形成和发展，积累了成批的、较有连续性的实物资料。

辽宁省旧石器时代考古，解放前几乎是个空白。1955年建平县南地乡首次发现了属于更新世晚期智人阶段的“建平人”上臂骨化石^①。近年的重要发现有：

营口金牛山和本溪庙后山旧石器早期文化遗存^②。这两个遗址与石器、灰烬等同类位出土的动物化石有中国鬣狗、梅氏犀、肿骨鹿、三门马、硕弥猴、大河狸等，金牛山还出有较早的中国大河狸，庙后山出有剑齿虎。这是一组典型的中更新世华北动物群，时代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相当，是辽宁目前发现的最早的两处古文化遗址。

两处遗址目前出土石器都不多，可以看出特点是保留有较多原始性。用锤击法和砸击法打制；多利用自然石面为台面，以石片石器为主，石片多单向加工，石片角约在 110° 左右，器型单调而不规整，体形较小，类型有圆形和半圆形刮削器。这些特点比较接近于北京周口店第一地点——峙峪系。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遗址发现的大量兽骨碎片中，相当数量有明显的人工打击痕迹，个别有清楚的使用痕迹，属于骨器的可能性很大。这对于我国旧石器早期是否已出现骨器的讨论很有参考价值。

喀左鸽子洞旧石器时代中期洞穴遗址。位于大凌河西岸^③。洞穴有过道和洞室，洞口高出大凌河床30多米，对岸是开阔的扇形台地，是一个既利防御、又有活动余地的理想住地。洞内有近2米灰烬层，烧骨碳化程度很高，是长期用火的结果。出土的石器和石器材料达三百余件，石器形态和加工技术较金牛山要进步得多。如石料多选用硬度较大的石英岩，掌握了一定的修理台面技术，出现第二步加工和交互打击法。器型较多，仅刮削器就有单刃、复刃和凹刃几种。无论类型、尺寸大小及基本制作方法都接近周口店北京人文化。从洞内出土的最后鬣狗、披毛犀等动物化石分析，这个洞穴遗址的时代为旧石器中期偏晚，距今约十五

万年左右。

旧石器晚期文化遗址发现地点较多。其中以凌源县西八间房发现的一处相当于旧石器时代末期的文化遗存较为重要^④。这个遗存发现一批具有细石器文化特征的石器，同层位出有原始牛、普氏羚羊、斑鹿等动物化石。贾兰坡同志认为这是目前我国发现的唯一有明确地层关系而又有相当数量古生物作为依据的、旧石器向细石器过渡的一个文化遗址。无疑，它对研究当地旧石器和新石器文化的关系以及细石器文化起源问题都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性。

以上的发现，初步建立了辽宁地区旧石器时代早、中、晚期的年代序列，扩大了我国旧石器文化分布范围，对研究我国华北和东北地区旧石器的文化的相互联系提供了资料。

辽宁新石器时代考古工作，近年来在三个地区都有重要进展，即旅大地区、沈阳市郊和辽河上游的老哈河、西喇木伦河流域。

旅大地区长期以来只知道是龙山文化在我国东北的一个分布区。经历年调查，在靠近海岸的山坡台地，发现了上百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多数有贝丘堆积，其中有的遗址出有彩陶和压印“之”字纹陶，说明这些遗址的时代和文化面貌并不单一^⑤。1976年以来，我们发掘了旅顺郭家村、于家和长山列岛的几个遗址，其中长海县广鹿岛土珠子遗址发现的有明确地层迭压关系的三层文化，在旅大地区很有代表性^⑥。

土珠子下层文化以一种压印“之”字形编织纹和压印条纹直腹罐为其主要陶器形制。陶质为夹砂红陶或红褐陶，多含滑石粉，手制。石器有打制的石片石器和石网坠，磨制的斧、刀和磨盘、磨棒，打制多于磨制。有用滑石陶片加工成的陶纺轮。兽骨多见鹿骨，也有犬和獐类。堆积中有大量贝壳。房址为方形圆角半地穴式。同类遗存在旅大其它地区也有发现，重要的有上马石三区下层、柳条沟东山和新金县塔寺屯等。

土珠子中层文化的陶器仍以夹砂红陶、红褐为主，但滑石陶已少见，增加了细泥红陶。纹饰大量为刻划纹（有平行斜线、人字网格等），压印纹很少，且作窝点状，不见压印“之”字形编织纹。器形除仍多见直腹罐外，出现实足鬲、三足觚形杯、圆锥足的罐形鼎、豆、盂等器类。这一层出有彩陶，其中下部地层多涡纹黑彩，上部地层多平行斜线黑彩。石器有磨制的斧、镞、方形刀、扁平柳叶式镞、磨盘、磨棒，打制的除石网坠外，有铲和陶刀、扁平陶纺轮，磨制多于打制。兽骨除鹿、犬以外，出现猪骨。房址也为圆角方形半地穴式。可以看出，土珠子中层与下层有明显的继承关系，但增加了大量新因素，属于这一层的遗存还有吴家村和郭家村下层

土珠子上层文化以夹砂黑褐陶和泥质黑陶为主，有一定数量的磨光蛋壳黑陶，出现快轮制法。红褐陶明显地减少了。器表以素面磨光为主，刻划纹已少见。器形多扁凿足、环形足的盘式鼎、镂孔豆，出现袋足鬲。石器绝大多数为磨制，有扁平石斧、有段石镞、双孔石刀、石镰、舟形石网坠和扁平凹底三角形石镰，具有浓厚的龙山文化特征，但又有自己的特点。兽骨多猪和鹿。房址出现圆形，有木骨草拌泥土结构的墙。同类遗存有郭家村上层、上马石三区上层以及四平山和老铁山积石墓等。

土珠子遗址三迭层的发现，初步确立了旅大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的年代序列。证明在旅大地区，不仅有相当于龙山文化阶段的遗存，也有相当于大汶口文化、包括大汶口文化早期阶段的遗存，特别是还有更早阶段的、以压印“之”字形编织纹为主要特征的遗存。这三层文化，自身特点明确，发展关系清楚。中、上层受山东原始文化影响较强烈，下层则与沈阳新乐下层和辽西诸新石器文化类型较为接近。

沈阳市地处辽河下游，介于旅大和辽西两地区之间。1974年以来在市区北部新乐村发掘的一处遗址，其下层有饰压印“之”字形纹、条纹、窝点纹的夹砂红陶直腹罐、斜口直腹罐、短圈足钵和细石器平底三角形箭头、长石片、石磨盘石磨棒等，陶、石器制作精细，揭露房子的烧土面多处。碳14测定年代在距今六千年前⑦。与新乐下层不同的是附近市东郊新民县偏堡遗址，偏堡出土的直腹罐饰细堆纹和刻划纹，不见压印纹，有短圈足钵形器和制作精细的细石器石片。其直腹罐形制和刻划纹饰接近土珠子中层⑧，时代应较晚。所以，新乐下层和偏堡可能代表了下辽河流域新石器时代的两个阶段。

辽西地区历来被认为是北方草原细石器文化的主要分布地区。解放以来的工作注意在划分类型的基础上进行分期的探索。目前，这个地区的新石器时代文化遗存可以区分出以下四种类型：

林西沙窝子遗址。1956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在这个遗址的发掘中，出土较多大型石核石器，细石器多圆锥石核，陶器少，仅有饰压印“之”字形纹夹砂直腹罐，陶质粗劣，较附近分布的富河类型和红山类型遗址具有显明的原始性，可能代表了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较早的一个阶段⑨。

富河类型。以林东乌尔吉木伦河流域的富河沟门遗址为代表，陶器仍以夹砂灰陶直腹罐为主，出现斜口直腹罐和短圈足钵形器，压印“之”字形纹多见一种连点状纹，个别见细泥红陶。大型打制石器定型，细石器多见窄而长的石片，制作技术相当进步。这类遗存主要分布在昭盟北部西喇木伦河流域，时代应较沙窝子一类遗存为晚⑩。

红山类型。以老哈河流域发现较多。各遗址间又有所差别，以敖汉旗四棱山和三道湾子遗址为例⑪：

四棱山遗址位于高出老哈河河床200约米的山坡上，遗址西南揭露出六座陶窑。在遗址采集和陶窑周围出土的陶器，以饰压印“之”字形纹和刻划纹的夹砂灰陶直腹罐、簸箕形斜口器等为主，泥质陶少，主要是泥质灰陶的瓮、鬲、盆等。这个遗址的特点是离河岸较远，遗址所处位置较高，文化堆积薄，细泥红陶和彩陶发现很少。具有这种面貌的遗址近几年发现的还有赤峰转山子、官地、翁牛特旗头分地等。

三道湾子遗址在四棱山遗址东北约二十五公里，位于村南老哈河东岸台地上，高出河床20—25米，与四棱山位于离河较远的高山坡情况不同。文化堆积也较厚。清理的一座灰坑出土陶器成分与四棱山也有很大差别，以泥质红陶为主，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都较少见。细泥红陶质的彩陶器（钵、盆为主）占较大比例，彩陶花纹为红山文化常见的菱形纹、涡纹、蝌蚪纹、垂帘纹等，外表多施红衣。石器多大型农业工具，磨石器多而细石器少。面貌相近的遗址近年发现的还有赤峰水泉、翁牛特旗红山水库和西喇木伦河北岸的海金山遗址等。

以四棱山为代表的一类遗址和以三道湾子为代表的一类遗址的差别，可能反映红山文化本身时代早晚的差别。

红山类型的石、陶器都比富河类型进步，两个类型分布范围虽有交错，但富河类型似偏北，红山类型则在昭盟南部和朝阳地区较集中，它们可能是当地新石器文化发展过程中的两个分支。

小河沿类型。这是近年在辽西地区区分出来一种新的文化类型。代表性遗址有敖汉旗小河沿公社白斯朗营子村的南台地和翁牛特旗解放营子公社石棚山墓地⑫。陶器除泥质红陶、彩陶外，出现磨光泥质黑陶，钵较少，而镂空豆、双耳壶形器多见，夹砂直腹罐饰划纹、细

绳纹和细绳纹组成的菱形回字纹，不见压印“之”字纹。与红山类型既有明显承袭关系，又大量出现新因素。磨石器发达，细石器箭头和骨柄刀嵌入物多通体细加工。石棚山墓地已发现的70多座墓，皆仰身屈肢葬，分区埋葬，随葬品数量差别较大，随葬生产工具绝大多数为男性墓，出现男女二人合葬。这是研究我国北方原始公社解体一批难得的资料。

小河沿类型是介于红山类型和当地早期青铜文化之间的文化遗存，它的确定为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文化发展序列填补了一段空白。

二

辽宁地区青铜时代文化，从目前掌握的考古资料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早期青铜时代的丰下类型（即夏家店下层文化），商周之际青铜器及有关遗存；西周至春秋战国之际遗存（包括夏家店上层文化）。

丰下类型主要分布在辽西大凌河中上游和老哈河流域，遗址点稠密，文化堆积厚，有的达6到9米，是我省多年来考古工作的重点项目。

1955年喀左县（原凌源县）马厂沟小转山子的发掘^③，发现这一类型的一座窖穴被一座西周早期窖藏铜器坑打破，从而认识到这类遗存的时间不晚于西周早期。1960年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赤峰县夏家店、药王庙的发掘，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类型属于铜器时代^④。近年来，这类遗址发现五百处以上，经发掘的北票、丰下遗址和敖汉大甸子墓地^⑤以及建平水泉、赤峰四分地等，这就大大丰富了我们对此类遗存的认知。

这是一支长期定居的农业文化。石制农业工具类型多而定型，趋向小型化。磨制有肩石铲是最多见的一种，打制亚腰石锄和横截面呈三角形石刀也很具特征。这类遗址发现小件青铜器具的已有多例，其中大甸子墓葬出土铜器有的已使用了合范和内范。四分地出土的一件陶范，有合范的母模和刻划符号，表明当时的青铜冶铸技术已不是最原始的了。制陶出现快轮制法，玉器制作的熟练可达到浮雕、镂孔的效果。房屋普遍用土坯砌墙，这可能是当地由半地穴居过渡到地上居住的一个标志。

丰下、水泉等遗址都揭露出成群的房址，其特点是：多有附属建筑，如紧贴在大房间旁的小房间、似院落的空地、附属的窖穴等；有防御性设施，如土坯墙外加一道或多道石围墙，遗址四周多有村落围墙和壕沟，在遗址群周围山顶上也有近似哨所的一类的建筑遗迹，反映财富私有的进一步发展已引起氏族、部落间冲突的经常化。墓葬也有相应的现象。大甸子等地墓葬普遍设有专门放置随葬品的壁龛，随葬猪、狗的数量、组合、彩绘陶器的使用，都有固定规格。这种礼制化的特征，可能为我国阶级、国家的起源提供某些具体环节上的例证。

丰下类型有一整套特征明显的陶器群：三足器鬲、鼎、特别是甗都很发达，甗、鬲的特征是袋足下附加圆锥形实足，一种磨光泥质黑陶鬲，大口、无领、深腹、束腰、短袋足，是这一类特有的器类。有早晚发展脉络可寻的代表性器类还有：肩部附双螯耳的绳纹大口盆，腹饰多道弦纹间绳纹或蓝纹的大型瓮，瘦长腹绳纹大口罐，细高柄浅盘式豆等。这一组陶器群具有商文化、特别是早商文化陶器的浓厚作风，它与商文化的关系已引起普遍注意。

关于这类遗存的分期，近年工作的一个重要收获是分辨出其中较早的一个阶段。如丰下遗址可明确分为三层，下层陶器磨光泥质黑陶较多，且火候高、外表漆亮，有通体轮制的器物。瓮、盆、罐口沿以下磨光部分较大，这与上层红褐陶增多、磨光黑陶减少的情况相比变

化很大。与丰下下层大体同一时期的主要有水泉下层、四分地和小河沿的南台地。这几个遗址分别出有篮纹大口盆、腹饰凸弦纹的大平底盆和宽足盆式鼎。水泉下层的房址全部为半地穴式，室内为烧土面，不见上部地层的土坯砌墙、白灰铺地的形式，四分地遗址更以深1.5米以上的地穴式房子为主。以丰下下层、水泉下层和四分地为代表的遗存，是辽西地区目前发现的这一类型最早的部分。由于它具有较浓厚的龙山文化因素，我们曾认为，它的年代应相当于龙山文化的某一阶段。丰下中层碳14测年代为距今3800年，下层当接近4000年，也证实了这一判断。至于这类遗存延续到什么时候，尚缺乏准确判定的材料。根据大甸子墓葬碳14测定时间在距今3500年左右的情况，估计它的主要堆积时代在距今3500—4000年间是适宜的，即跨越我国历史上夏到早商这一阶段。夏到早商是我国民族文化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当时分布在燕山南北地区的这一文化类型生产力发展水平、社会发展阶段与黄河流域大体相当，文化面貌则具有更多早商文化特点，我们认为它应是商文化的形成因素之一。

商到西周早期这一阶段的文化遗存，以商周之际青铜器为主。1955年喀左（原凌源）马厂沟出土的以燕侯盂为主的西周早期窖藏铜器群是一次重要发现。近年来，在马厂沟附近大凌河两岸的北洞、山湾子、小波汰沟又陆续出土了商周铜器群，朝阳木头城子、大庙、赤峰西牛波罗以及西喇木伦河北岸的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和抚顺市郊也出有同一时期青铜器，到目前为至，辽宁出土商周铜器的地点已达十多处，分布遍及辽西，跨过辽河^⑩。

商代青铜器的发现是辽宁商周考古的一个突破。其中商器单独出土的三例：一是朝阳地区收集的一件弦纹鼎，鼎作小环耳，直腹很深，三短足呈扁锥状，足中空，是一件商代中期典型器，它代表了辽宁青铜文化一个较早阶段，很可注意克什克腾旗天宝同出土的弦纹觚，上体特大，两耳直插内壁，时代相当于安阳前期，是目前我国商器出土最北的一个地点。北洞一号坑所出五罍一甗都是商代晚期器，其中一罍铸铭六字：“父丁鬯[△]兕亚”。唐兰同志根据这批商器的出土，认为喀左一带是商孤竹国范围。有释“鬯[△]”即孤竹^⑪，对此虽有不同意见，但辽宁地区已有商代青铜文化分布这一点已可以得到证明。

西周早期铜器主要是喀左出土的几批。虽然都是窖藏性质，但器物时代除山湾子群有的可能稍晚以外，都不会晚到康王。随着北京琉璃河燕墓发掘的进展，喀左铜器与西周早期燕的密切关系可看得更加清楚。山湾子出土的“伯矩”觚和新近小波汰沟出土的“圉”簋分别同北京琉璃河燕墓所出“伯矩”器和“圉”器为同一族组器，琉璃河“伯矩”鬲和“圉”方鼎都记有这两个族在周初与燕侯的从属关系^⑫。这是继燕侯盂之后把辽宁出土铜器与西周早期的燕联系起来的又两个例证。器物形态也近于琉璃河铜器群，以中原作风为主，又表现出某些地方特点，如形制独特的鸭形尊、贯耳壶等。

北京琉璃河燕墓部分铜器铭文铸有商的族徽，喀左几批铜器也有类似情况。如“嬰”方鼎，内底正中铸“鬯侯亚戾”为商一钺族，延续到周初，芦沟桥清末出土的亚盃记有鬯族人“亚”受燕侯赏赐，所以喀左出鬯器也并非偶然。陈梦家先生认为这个“亚”是殷遗，是很有道理的^⑬。商人后裔在燕山南北地区的继续存在，是西周封燕的主要原因，也是西周早期燕迅速发展的基础。

此外，抚顺出土的环首铜刀，新民出土的盞式斧、兴城出土的盞式戈等一组器物以及朝阳地区收集的鹿首刀等，时间都在商到西周时期，它们的地方特点都比较明显。1970年初，在朝阳魏营子还首次发现西周早期墓地，发掘和清理墓葬八座，都为木槨结构，填灰膏泥。其中第7101号墓规模较大，出土铜器中有盃、盞铃、车舌、方圆形泡饰，都为西周早期形式，共

出的长方、圆盘式甲饰多件则为前所未见。魏营子墓与邻近的北京昌平白浮村西周早期墓葬结构和出土铜器都比较接近^{②①}，是西周早期燕国境内青铜文化的一种重要类型。

辽宁境内商周之际青铜文化这种多样性面貌，在大体相当于这一段的遗址中也有所表现。如魏营子墓葬所在台地的遗址，出土陶器以素面红褐陶为主，绳纹也较多见，器形以一种口沿饰花边的鬲最具特征。北洞、马厂沟、宁城西门外都发现类似遗存。魏营子遗址被西周早期墓打破，可知这类遗存的时间不晚于西周早期。辽河以东大约相当于商周之际的遗存有沈阳新乐遗址上层和康平顺山屯遗址。新乐上层鬲、甗、鼎具备，从鬲、甗形制看时间可能有与丰下类型晚期相当的部分^{②②}。顺山屯遗址则多鬲、壶，无豆，碳14测定年代在距今2900年以前，也在商周之际。新民、抚顺商周铜器发现地点也都见这类遗存。以上各类遗存的共同点是都有发达的三足器，红褐陶为主，表现出与中原文化有密切关系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左传·昭公九年》：“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这是有关商周王朝北方疆域的重要记载。辽宁地区大批商周铜器和有关遗存的发现，与这一记载相互印证，进一步证实商周王朝北部疆域已达到长城以北。

西周春秋战国之际的遗存，有遗址和墓葬两个部分。遗址的工作以辽西地区做得较多，包括赤峰及其周围地区的夏家店上层文化^{②③}。近年这类遗址的重要发现有建平水泉中层遗存和林西大井铜矿。

水泉遗址位于河旁一平坦台地，水泉中层（上层为战国层，下层为丰下类型）有1—2米的堆积，发现房址、窖穴和一批陶器。陶器以红褐素面的鬲、鼎、豆为主，还多见一种大型陶瓮，已复原的三件，高近1米，腹径0.7—0.8米。与这类大型贮藏器有关的是，在三座直径近2米的窖穴底部，都堆积了厚80厘米以上的碳化谷物。出土的家畜骨骼中猪骨有一定数量，从各个方面都反映出定居农业在其经济生活中所占有的重要地位。

林西大井铜矿在西喇木伦河以北三十公里大兴安岭余脉的一个平缓的山坡上。在二平方公里范围内就分布有露天开采的矿坑40余个，矿坑最长500米，深10米，最宽仅0.6米。采坑周围的地表遍布石制工具。1976年我们在试掘时采集石器达一千五百多件，形制有镐、锤等多种类型，大小不一，最大的重达七公斤，共同特点是腰部均琢磨凹槽一周。在第5号采坑上部揭露房址三座，其中一座屋内堆积石器二百余件，当是工棚一类建筑。在5号采坑不远的地方，发现一排炼炉址，有炼炉八座。炉址旁有鼓风管、炼渣和铸小件器物的陶范。这是一个包括露天初采、选矿、冶炼、铸造等全套工序、规模很大的古代铜矿山遗址。迭压在矿坑上的房址出有夏家店上层文化陶鬲，碳14测定年代为距今2700—2900年^{②④}。所以这是我国目前发现的年代较早的一座铜矿遗址。

辽西地区这类遗存（包括夏家店上层文化）拥有比较发达的农业和较长期的定居生活，能从事规模很大、工序齐全的青铜采冶业，这对于认识其文化性质的包括的族属，是很有启发的。

这一时期的墓葬，以青铜短剑为其主要内容。继朝阳十二台营子、宁城南山根、沈阳郑家洼子等地发现大型墓葬之后，近年又在宁城东山嘴、喀左南洞沟、凌源三官甸子、清原三家等地墓葬出土了成组青铜器^{②⑤}。西喇木伦河以北的克什克腾旗、巴林右旗和旅大长海县近年也出土了青铜短剑，分布面遍及辽宁各地，而以老哈河、大凌河流域为最集中。进一步证明辽宁是我国北方出土青铜短剑最密集的一个地区。

已出土的短剑，可分为三类。除柄、身连铸的匕首式短剑和柄、身分铸的曲刃丁字形把手短剑外，近年还确定了一种矛式曲刃短剑。这种剑以曲刃、柱脊、有另按木质剑柄的甬为特点，过去定为矛，近年因出土较多，长度多大于或相当于上述的两类剑，有长达60厘米，当为短剑无疑。矛式短剑具有曲刃、柱脊、另按剑柄的特点，又多与匕首式短剑共存，是探索各类青铜短剑发展演变很关键的一种类型。

出匕首式短剑和矛式曲刃短剑的墓葬，以南山根第101号石椁墓为代表，这类墓葬主要分布在老哈河两岸，大凌河流域及其以东几乎没有发现。从南山根101号墓、宁城东山嘴墓共出的铜礼器、兵器分析，这类墓葬的时代主要在西周晚期到春秋早期。南山101号墓和宁城黑石沟还都共出具有当地夏家店上层文化特点的鼎、豆等铜容器。可知这类墓葬是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一个阶段的遗存，可称为“南山根类型”。

丁字形把手曲刃短剑形制较复杂，根据剑身、剑柄的变化，又可分为三式。第一式以十二台营子剑为代表：体长，叶肥，曲刃明显，尖锋甚短，木柄。这一式剑也见于南山根类型墓中，时代较早，约当春秋时期或更早，主要分布在老哈河和大凌河流域。锦西乌金塘、辽阳二道河子也出同式剑，但形体已较小；第二式以南洞沟剑为代表，叶已不肥，曲刃不显，锋部较长，有饰勾连雷纹的剑柄，据南洞沟共出的铜簠、车害，可明确定为春秋晚期到战国早期。锦西寺儿堡出同式剑，沈阳郑家洼子剑也相接近；第三式剑以后牧城驿一号墓剑为代表，窄身、直刃、长锋、有饰细鳞纹的剑柄，此式剑主要见于辽东半岛，后牧城驿共出有燕明刀钱，已到战国晚期。

以上虽然只是初步的划分，然已可看这类早晚演变的基本规律和地域分布及变化趋势。

由于丁字形把手曲刃短剑分布地点广、延续时间长，共存铜器、陶器也各有差别，可能分为若干类型。以共存陶器的差别看，辽西这类墓葬多出有素面红褐陶壶、罐，陶质、形制都接近当地夏家店上层文化，估计也是属于夏家店上层文化某一阶段（晚于南山根类型）的遗存。辽东郑家洼子、二道河子、亮甲山、后牧城驿等地出土陶器也各有特点，分别同于当地遗址所出陶器，可能反映当地诸原始文化吸收这一青铜文化的过程。另以这类墓葬所含中原文化因素的差别看，喀左南洞沟墓出土一燕式铜簠和一组车战制度的基本组合（象征二马一车的双銜双车害和一戈一剑），而丁字形把手曲刃短剑就是这一典型中原式铜器组合中一个基本要素。这种具有浓厚燕文化特征的墓葬还有凌源三官甸子（出一燕式铜鼎、一戈），宋杖子（出中原式直刃剑一柄），它们主要分布在靠近燕山山麓的喀左、凌源一带，显然同这一地带靠近燕国中心地区并与当地燕文化的传统有关。所以，辽宁出青铜短剑的墓葬又可分为若干地方类型。

关于辽宁地区出青铜短剑遗存的族属，有的认为十二台营子一类遗存属东胡族^⑤，近年因这类遗存分布点远远超出辽宁地区的范围，各地点面貌也互有差异，多认为包括了几个族属。考虑到这类青铜文化与当地上千年青铜文明历史的关系，燕国从西周早期以来对这一地区的经营以及这类遗存不同程度的具有中原文化、主要是燕文化因素等情况，有的同志认为，这类青铜文化主要反映了燕国境内各族青铜文化的面貌，而在它的发展过程中，又可看出与相邻各族文化的不断交流融合过程，也是值得重视的一种观点。

三

战国时期，辽宁省为燕国右北平郡、辽西郡和辽东郡辖境，秦汉延续，东汉增设辽东属

国。

在商周文化与东北各族文化长期融合的基础上,随着燕秦政权在辽宁地区的进一步确立,反映在这一时期考古材料上,已基本是中原文化面貌。

辽宁地区的战国遗址普遍出有铁器。抚顺莲花堡、鞍山羊草庄,宽甸双山子和敖汉老虎山都有镢、雷、锄、铲、掐刀等成批铁工具出土^{②6},这些工具,据今天分析当为“高温液体还原法”铸造。种类、形制、冶炼技术都同中原地区一致。我国大量铸造和使用铁器在战国中期以后,当时燕国冶铁技术在各国中较为先进,差不多同一时期,辽宁地区也已达到与中原相接近的水平。

战国时期墓葬,已发现的有赤峰初头朗,凌源安杖子,喀左眉眼沟和沈阳市热闹街等地点^{②7}。虽都是小型墓,却都有鼎、豆、壶或鼎、盆、壶的成组陶器随葬,多数有木棺,有的为一棺一椁。可见燕国北部地区同中原一样,也在经历各阶级社会地位变化和礼乐制逐步崩溃的变动时期。

燕秦长城是这一时期的著名遗迹。据《史记匈奴列传》记载,这条长城由河北进入辽宁境内。多年来,史学家、考古学家对燕秦长城在辽宁境内的分布情况,进行过推定和局部勘查^{②8},在此基础上,1975年我们组织了一次普查。这次普查的主要收获是确定了燕秦长城的辽西部分分为东西走向的南北两段,北段沿英金河北岸横贯赤峰县、敖汉旗,从吉林奈曼、库伦南部进入阜新县。南段经喀喇沁旗和赤峰南部,越老哈河,过建平县北和敖汉旗南部进入北票县,南北两段间距四十至五十公里。长城的构筑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高山以石垒,过河有渡口,平地用夯筑。石城墙址在赤峰水地、美丽河和敖汉贝子府都有保存较好的地段,墙高尚存1.2米,断面作梯形,底宽2.4米,顶宽2米左右,蜿蜒起伏于辽西高山峻岭之间。

在燕秦长城沿线新发现一批城址和遗址。特别是出土了一批明确的秦代文物,如赤峰蜘蛛山遗址出有印秦始皇诏书的陶量器^{②9},赤峰三眼井和敖汉老虎山出有秦代铁权,重量都在30公斤上,三眼井铁权也有秦始皇诏书铸文。这些秦文物的出土,证明随着秦的统一,秦王朝已迅速在遥远的东北地区建立了地方政权,并有效地进行统治。

西汉中央政府在东北地区进一步加强了政权建设。文献记载,西汉在辽宁地区设郡县四十多个,目前在辽西和辽东半岛已发现汉代城址二十多处,确定这些郡县址的位置已有重要进展,如汉右北平郡址和汉安平郡址的确定就是其中重要的两项。

右北平郡郡址即宁城县黑城子城^{③0}。这座城子位于老哈河上游西岸,老哈河两条支流黑里河和五十家子河交汇处的三角地带,紧靠宁城县凌源县及河北省平泉县交界处。部分城墙轮廓清楚。这座城址解放前已发现,1954年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做过调查。今确定该城址为右北平郡郡址的主要是近年的两项发现。一是1976年在城内西南部揭露出一座王莽时期钱范作坊遗址。出土的“大泉五十”和“小泉直一”范母上,分别印有“始建国元年三月”和“前(后)锤官工哀造卅一”字样。《汉书·王莽传》记:“遣散大夫五十人,分铸钱于郡国”。范母“锤官”是汉代中央政府主管铸钱的官职,“卅一”为分铸钱的郡国编号,黑城子钱范作坊应是新莽时期郡国铸钱址的一部分,黑城子城址为一郡址无疑。又城内发现的两块封泥,文为“渔阳太守章”,“白狼之丞”。汉渔阳郡治在今密云县,与右北平郡相邻,相邻郡和郡及所辖各县间,一般情况下只有同级之间的来往,更可知黑城子绝不是县治。至于白狼县为右北平郡下属县治,上下级间的往来是理所当然的了。根据《汉书·地理志》关

于右北平郡的记载，平刚为郡治所在，多考证平刚在今平泉县，距黑城子尚有六十多公里，应予更正。

汉西安平县址即今丹东绥河尖村城址，位于鸭绿江下游北岸，1961年发现。城近方形，东西500、南北600米，城墙存高1米左右。城内南高北低，中部凸起的土台上有密集的灰陶绳纹板瓦和西汉五铢钱等，当是建筑址，城东有西汉墓葬。《汉书·地理志》记：“马訾水……西南至西安平入海”。马訾水即鸭绿江，所记西安平位置与绥河尖城相符。1976年城内出土一件圆瓦当，文“安平乐未央”，此城址即汉西安平县址得到进一步确认。又西安平文献有称“安平”者，此瓦文也为“安平”，“西安平”有可能是“安平”之误。

汉代遗址，北从西喇木伦河以北的林西县西门外，南到旅大长海县广鹿岛都有分布，1954年发掘的辽阳三道壕遗址，工作规模较大^②。揭露的10,000多平方米面积内，共发现居住址七座，都是包括房址和土窖、畜栏、厕所、猪圈、水井等附属建筑的独立单元。附近并有烧砖窑址和铺石大路，房址内大都出有成套铁农具，比较全面地反映出西汉时期辽东郡农业生产和生活面貌。两汉墓在辽西、辽东都有发现，在已发现的东汉墓中，以辽东半岛的沈阳至旅大地区为密集，而辽阳为其中心地区。1953—1955年在辽阳三道壕、唐户屯、鞍山东地、海城大屯等地发掘的上千座两汉墓葬，多数用石板和青砖筑室，其中东汉墓葬大都随葬陶井、灶、仓、房、尊、灯、案、耳杯、反映出东汉以来辽东地区封建经济的发展。辽阳的这些墓葬有的延续到汉末到魏晋^③。1953—1957年辽阳棒台子清理的两座汉魏之际墓葬，结构是青石板支筑的包括棺室、回廊、耳室、小室的多室墓，墓壁绘车骑出行、杂技舞乐、庖厨等内容的大幅墨彩壁画。这种多室墓在辽阳一带一直延续到西晋，但已简化。高等级的大型多室墓在辽东出现及其演变，是与汉末以来公孙氏割一辽东一隅的历史背景分不开的，也反映了当时中原战乱，山东、河北等地流民与当地人民共同开发辽东出现经济文化繁荣的景况。

秦汉以来辽宁地区政治经济的发展，都伴随着汉族与当地和相邻地区各族文化的相互融合过程。继西丰西岔沟匈奴墓群发现之后^④，又在西丰、赤峰、翁牛特旗发现同类墓葬和文物，出土的髹发人物形象、鎏金铜梳等为前所未见，为了解西汉时期这个民族的分布、习俗提供了新资料。

公元三世纪后，我国历史上以汉民族为主体的民族大融合进入一个新时期。当时辽宁地区的鲜卑族在汉文化影响下迅速封建化。解放以来，在北票房身发现的公元三至四世纪的石板墓群和锦州、义县等地发现的这一时期的鲜卑族墓葬，特别是1965年北票西官营子北燕冯素弗及其妻属墓葬的发现，都比较典型地反映出这一历史情况^⑤，北燕是公元四世纪初迁到辽西的汉族统治阶级冯氏在前燕、后燕基础上建立的鲜卑族国家，冯素弗是北燕王冯跋的弟弟。这是第一次发现时代明确的北燕墓葬，也是十六国时期有年代可考的一座重要墓葬。这座墓所具有的同坟异穴、石椁结构的墓室、外椁西壁设小龛，棺内祔葬儿童、随葬器物中的大镂空高圈足铜釜、多种类、多数量的铁器以及殉犬等，都表现出鲜明的地方色彩和鲜卑族传统风俗。但这座墓主要部分是使用了当时汉族上层统治阶层的制度，如壁画以星象、出行、家居为主要题材，确定墓主人姓名的四颗印章为龟纽形制，官爵名称（范阳公、辽西公、大司马、车骑大将军）承袭了魏晋官制，成套的文房用具，樽、魁、洗、镊、镊斗、漆盒等铜、漆食具和用具、仪仗用的鎏金铜具等，也都是汉族文物制度。冯素弗墓所反映的北燕物质文化面貌已基本是封建的汉文化，正是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民族大融合总趋势的表现。中出土的鎏金铜片包木心双马镫，是现知有确切年代的同类器物中较早的一副，可知由晋

代只供上马用的单镫发展为马上承足的双镫这一骑乘的重大进步，当约在十六国时期我国北方一带首先出现。出土的多件玻璃器皿，体薄质纯，色鲜丽，其中一件鸭形水注，装水适量才能放稳，是经过精心设计制造的。我国目前所见玻璃中较早的这批实物，是否国产品，尚待进一步考定。

继南北朝民族大融合之后出现的隋唐大一统局面，促进了当时经济、文化的繁荣。辽宁地区隋唐考古资料，主要是1958年以来在朝阳一带陆续发现和发掘的一批墓葬。

朝阳是隋唐时期营州（柳城郡）治所，根据附近出土的多方隋唐墓志记载，隋唐时期营州治所就在今朝阳镇。已发现的隋墓大都是方形单室的砖室墓，出土的六耳青瓷罐、青瓷盘口瓶、形体修长的彩绘陶俑和隋五铢钱等，都是典型的隋代文物。唐墓多单室，少数为双室和三室，墓室除方形外，还有当地特有的圆室墓。出土的青、白瓷器、三彩器、铜镜和铁工具，都具有当时唐代一般技术水平。天宝三年韩贞墓所出三彩三足罐形炉，体型丰满、赋彩自然，除绿、白色外还显出蓝色，腹部堆塑龙纹，是已发现的同类器中的上品^⑤。朝阳唐墓多见泥俑，在制模、造型、装饰加工、着色、烧造等方面都有突出成就。张秀墓石棺板的大幅浮雕龙虎和韩贞墓出土的石雕子母狮子，也都反映了唐代艺术的高度水平。

这批隋唐墓从形制、随葬器物种类、多寡，同墓志所记墓主人身分等级相合。这一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的繁荣，是同营州在当时中央政府与东北各族往来中所处的地位分不开的。随着契丹、渤海、高句丽等族的先后兴起和强盛，隋唐王朝加强了同这些部族的联系，营州处于这一往来的要冲，必然得到中央王朝的重视。新近在朝阳县凌北公社新荒地村发现的隋大业八年韩暨墓，墓志记有营州籍隋官吏韩暨多次往来与营州和东北各部族间。其中开皇四年他受中央政府之命出使契丹，使契丹主莫贺弗于同年五月来朝。这是营州地方政权在隋把王朝与契丹等族往来中所起作用的重要资料。

以上朝阳发现的唐墓，都有强烈的时代特点，即大都是初唐以前的，个别为中唐，中唐以后的尚未发现。这同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和以后中央集权削弱、地方割据势力增强有关。而七世纪以来我国北方大族契丹族的兴起和强大更是一个重要原因。

四

公元九世纪初，契丹族联合汉族上层统治阶级，建立了辽王朝。辽设五京，三个在辽宁境内（上京、中京、东京），西喇木伦河流域又是契丹族发祥之地。因此，辽代遗迹遍布全省各地，而以西喇木伦河、老哈河、大凌河及辽河流域为集中。

辽代考古发现以墓葬为主。五十年代赤峰大营子辽应历九年驸马墓是出土遗物最丰富的一处。义县清河门，建平张家营子，新民巴图营子等地都有重要辽墓发现。近年以法库叶茂台辽墓群的发掘收获较大。已发掘的近二十座墓中，第7号墓随葬品丰富，保存完好。这是辽墓发掘中少见的^⑥。这座墓有前后室和左右耳室。安置在主室后部的一架小木作结构“小帐”，内覆罩大形石棺，棺壁、盖满雕卷草、四神花纹并填色彩绘。棺内一老年妇女，身上穿裹十余件丝织品的袍衫裙裳。棺室东西板壁悬挂《山水楼阁图》和《竹雀双兔图》两轴保存完好的绢画。辽墓中第一次出土的这两件五代到北宋初的作品，为那一时期绘画断代提供了可靠标本。1970年翁牛特旗解放营子辽晚期时，有用粗大柏木枋构成的八角形迭涩式顶大型木椁，内壁彩画，这是有关辽墓木椁结构第一次发现的完整材料。墓内还出有保存较好的木床、木桌、木椅。

以辽墓为主的大批辽代文物的发现，使我们对辽代经济、文化发展水平、辽文化的发展演变，都有了新的认识。

辽宁地区辽墓中大批汉文墓志的发现，对补充、印证《辽史》有一定价值。叶茂台北府宰相肖义墓志和朝阳姑营子耿延毅墓志有较文献更详尽的记载。北镇龙岗耶律宗政、耶律宗允墓志的记载还为寻找乾陵提供了线索。新发现的契丹墓文志中，翁牛特旗毛不拉沟“故耶律氏铭石”和阜新卧风沟“许王墓志”与庆陵哀册字体结构相同，一般认为是契丹小字^⑦，阿鲁科尔沁旗出土的“北大王墓志”和朝阳柏木沟耶律延宁墓志，字的结构与上述不同，且都同刻汉文，应当是大字。自辽庆陵哀册出土以来，对契丹文的释字已进行多年，这些新出土的材料推动了契丹文研究工作的进展。此外，兴城塔沟辽塔地宫出土的辽大安八年造塔记和诸杂陀罗尼造塔功德经，阜新塔基出土的金、银小塔篆刻经文，对了解辽上层统治阶级和宗教的关系都有一定价值。

丝织品是近年辽墓出土物中一项极珍贵的实物材料。叶茂台7号墓出土的丝织品包括绢、纱、罗、绫、锦和刻丝共六类九十多个品种规格。其中有首次发现的辽、宋时期丝织品用金的标本多件。关于丝织品用金，仅唐、五代一些文献中偶有谈及，过去一般认为这种技术出现当在元代以后。这次发现的标本，有片金刻丝、描金、捻金等数种，说明这种技术的使用在我国已有悠久的历史。7号墓出土的一件长约2米的刻丝裕被，以金为主色，织出升龙、火珠、山、水、海怪组成的复杂图案，为早期刻丝提供了一件典型标本。解放营子辽木椁墓获得的一批织锦、绫、罗、刺绣中，有用“夹纴”法印染的各种花纹。染纴唐代盛行，辽代实物还是首次发现。这两批丝织品，包括刻丝、描金、染纴在内，部分织品属于契丹人特有的服饰样式，可确认为辽地产品。辽代丝织工艺达到如此高度水平，这是我们以前所不知道的。

辽代冶铁业已很发达，遗址、墓葬都出土有大批铁器实物。近年昌图八面城（辽韩州）、阜新红帽子古城（辽成州）和赤峰等地出土了铸铎铜范，出土的铁锄都由锄钩和锄板二部组成，同近代铁锄大体相似。说明辽代的农区已很重视农田细作。叶茂台15号墓出土铁器包括兵器、手工工具、容器等类，是辽墓出土铁器种类和数量较多的一次，其中铁制手工工具类型尤多。以凿为例，就有宽刃、窄刃、圆刃、斜刃等多种型号，反映出辽代手工业已经有很细的分工。这批铁器中的兵器，已是优质低碳钢。

叶茂台14号墓还出土一件嵌银缠枝花鸟纹铁罐，较以前驸马墓和建平张家营子辽墓所出错银铁器工艺更为细致、复杂，可以作为辽代金银器加工工艺的又一代表作品。叶茂台7号墓所出银鎏金镂花捍腰，锤髹五个塔式建筑，塔身镶琥珀、琉璃珠，地髹鸾凤纹。以前在赤峰驸马墓出土过鎏金龙凤纹鞍桥，建平张家营子辽墓出土过鎏金双龙纹银冠，这种多层篆刻技术可以达到立体效果，但工艺要求很高，是继承了唐代金银器加工制作的工艺传统而又有所发扬。

辽瓷是我国古代陶瓷工艺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积累的上百件辽瓷精品，大都是墓葬发掘和清理出土的。其中的典型作品鸡冠壶、凤首瓶、三彩器都有新造型、新装饰、新釉色发现。三彩器中的鸳鸯壶、砚等新型式更可看出受到唐代的重大影响。确定辽代官窑和官窑产品是研究辽瓷生产水平所关注的课题。近年来除多次出有带官字款的白瓷器外，在赤峰缸瓦窑址曾采集到一件“官”字款匣钵（窑具），缸瓦窑在赤峰县西五十公里半支箭河的上游，与文献记载松山州西十公里有“官”窑的地理位置相吻合。这个匣钵的发现不仅进一步

确定辽代确有官窑，并且对寻找辽官窑址提供了线索。辽墓出土的中原名窑产品，以叶茂台和敖汉旗塔子、朝阳耿延毅出土的一批影青器为精品。朝阳纺织厂和北票水泉辽墓分别出土的青瓷狮嘴牡丹花执壶和“龙鱼”形水丞，也为青瓷中罕见的佳品。大批中原名窑产品流入辽国，是宋辽之间经济、文化交往密切的反映，也必然对辽瓷生产和辽地各阶层生活产生影响。

辽墓壁画近年的发现丰富多彩。保存较好的叶茂台肖义墓、翁牛特旗解放营子木椁墓和敖汉康家营子辽墓壁画，都具有场面大、形象生动、线条流畅的特点，还较多地保持着唐代以来寺观建筑壁画的宏伟气魄和粗犷风格。如肖义墓墓道两塑壁画各长10米，宽2米，近墓门处的武士高达3米。两壁的“出行”“归来”图，有驼车、队马及各种执事人物二十余人。画中人物多契丹人装束，用具也多契丹族特点。西喇木伦河流域的克什克腾旗二八地辽代早期墓，石棺内侧白灰壁上绘毡帐驼车、背水和放牧等场面，生动地再现了契丹族逐水草、牧牛羊的生活场面。辽代地下建筑保存较多的是塔。辽代盛行佛教（密宗），造塔之风很盛。在近年的普查中，结合文献记载，我们发现和重新鉴定出一批辽塔和塔基。这些辽塔大部分为平面六角和八角密檐实心式。这种实心塔源于唐塔，但较唐代的四角空心套筒式塔和宋代楼阁式塔都有重大改进。其优点之一是有较强的抗震能力。我们在调查1975年营口、海城7·3级地震木建筑受震情况时，发现位于极震区的海城析木城辽代金塔、海城辽代银塔均未遭破坏。除了地基条件外，实心多角是主要因素^⑧。辽代木建筑在辽宁地区仅有义县奉国寺一室大殿，这是目前保存下来的辽代体量最大的单层木架结构建筑。五十年代国家文物部门组织人力，对这座木建筑的年代、演变、成就作了进一步调查实测^⑨。1959年辽中京揭露的几座宫殿遗址，从布局看也都是中国传统木构架建筑形式。叶茂台7号墓小木作建筑由于是仿效的包括住宅在内的一般地上木建筑，而这正是辽代建筑史上的缺环，所以尤为珍贵。

关于辽代丧葬制度，叶茂台18号墓发现了完整的铜丝网罩，尸身、四肢全部套在其内，而过去发现的这种网罩多只套手足。叶茂台7号墓服饰有左衽、捍腰、套裤等，保留着游牧民族马上生活的特点，但缠尸，手握珠，鼻有塞都已属汉族葬俗。小木帐内罩棺则是继承了唐代葬俗。至于多室墓的大量出现，较《隋书》等文献所记唐以前契丹族盛行类似天葬的葬俗已有很大改变，这是由游牧转向定居在葬制上的反映。

随着辽墓分期的逐步确立，我们对辽文化的发展有了较多的了解，它大量吸收汉文化（主要是唐文化），与本民族文化融为一体，对我国封建社会后期各族历史文化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金是继辽在我国北方建立的国家。金代的考古发现，五十年代重要的有绥中城石村遗址和锦西大卧铺画像石墓。1961年在朝阳镇发现的大定二十四年马令墓，是一座有明确纪年的金墓^⑩。1976年赤峰县三眼井也发现一座金墓，这两座小型砖室墓，都有保存较好的彩色壁画。在传世金代绘画稀少的情况下，这些壁画对了解金代社会生活、绘画艺术都很有价值。

元代考古，五十年代内蒙古自治区文物队在昭盟一带作了较多的工作，如对应昌路的调查等^⑪。近年来的发现有林西等地出土的元窑藏瓷器，北票上园老虎沟清理的农村居住遗址，开原镇内窖藏和阿鲁科尔旗新发现的一座元代城址等。

辽代及其以后的考古工作，还以近年发现和收集的一批有关我国历代封建王朝管理东北疆域的考古材料为重要。其中有：

辽统和四年（公元986年）耶律延宁墓。墓葬位于朝阳县西五家子石片村，1964年发

现。墓志记载耶律延宁为“大契丹国故保义奉节功臣羽厥里节度史”，统和三年死于职守，次年归葬白崖山即朝阳城南柏山，年三十九岁。关于羽厥里的方位，《辽史·地理志》“边防城”条记：静边城“北邻羽厥，东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皮被河”条记：皮被河“出回纥北，东南经羽厥入胪朐河”，皮被河城“南至上京一千五百里”，胪朐河即今克鲁伦河，《辽史》所记及《通鉴辑览》等文献已有大量材料可以确认。羽厥里部活动范围当在今克鲁伦河流域及其以北，即黑龙江上游一带。墓志说耶律延宁任羽厥里节度史时的活动是“威极北之疆境，……荡灭顽凶、路不拾遗”，记录了辽王朝在黑龙江上游一带有效地施行管辖权的史实。

明景泰元年（1450年）崔源墓志和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宋国忠墓志②。

宋国忠墓志是1963年在辽阳鹅房村南发现的。墓志追记宋国忠“高祖卜花袭（爵），招谕奴儿干，征进三叉路有功，历升明威将军”。

崔源墓志1926年出土，见于著录。记崔源于“宣德元年，同太监亦信下奴儿干等处招谕，进指挥金事”。1975年我们根据文献记载提供的线索，在鞍山市东郊千山脚下倪家村村东找到了崔源族墓，并发掘了包括崔源及其子、都指挥使胜及以下几代人和妻属的墓葬十九座。出土的九合墓志及崔源墓志都记载了从明永乐到嘉靖一百五十间明朝政府管理东北地区及东北边疆各民族间经济往来和文化交流的大量史实。

奴儿干都司是十五世纪初明朝政府在黑龙江、乌苏里江流域建立的地方政权。明政府派往奴儿干的官员亦失哈（即亦信）等并在奴儿干都司治所的特林地方江边修建永宁寺，在寺前立碑两块。永乐十一年碑碑末题名有“所镇抚宋不花”，“百户崔源”，宣德八年碑碑末题名有“辽东都司指挥崔源”③。“宋不花”即宋国忠墓志中的“宋卜花”，而崔源“招谕”奴儿干，根据碑文和墓志所记年代，至少有三次，这些都是明朝政府不断加强对奴儿干都司管理的实物见证。

清雍正七年（1729年）荣宪公主与乌尔袞合葬墓。

墓坐落于巴林右音尔登公社十家子大队查干木伦河北岸，1966年发现。有陵园，置碑亭、配殿、正殿、墓在陵园后部。墓室为石条砌筑，有木椁、木棺，女性尸体保存甚为完好，肌肉组织尚未破坏，旁置一盛放骨灰的瓷罐。随葬品中，有大量金、玉饰品，珍贵的宝石、猫眼石和各类丝织物服饰。出土木质墓志一合，用汉、满文分写。记荣宪公主为康熙次女，下嫁蒙古王公、皇亲乌尔袞。乌“总督内属国二十三旗戎务，北讨测旺”，康熙六十年死，雍正七年与公主合葬。测旺即策旺阿拉布坦，是我国蒙古族准噶尔部反动贵族头目噶尔丹之侄，康熙末年在沙俄唆使下叛国。这座墓所反映的乌尔袞参加康熙平定策旺叛乱的记载和荣宪公主礼遇之隆重，都是康熙实行各民族和睦、打击沙俄制造民族分裂，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的历史见证。

最后要提到的是，在调查明清古建筑及其遗址的过程中，我们注意搜集碑刻史料，得到四件有关曹雪芹家世的碑刻。其中明成化廿三年《重修沈阳长安禅寺碑》有天顺二年关于沈阳中卫指挥曹辅的记载，碑阴又有沈阳中卫指挥曹铭的名字。据《五庆堂重修辽东曹氏宗谱》的记载，曹雪芹上世远祖有曹俊，“以功授指挥使，封怀远将军，克服辽东，调金州守御，继又调沈阳中卫，遂世家焉”。《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皇朝通志》等也记载曹雪芹上世曹锡（远即曹世选），曹振彦等“世居沈阳地方”，《江宁府志》、《上元县志》还有曹世选“令沈阳”的记载，将长安寺碑与这些文献记载对证，则碑上曹辅、曹铭显然是曹俊后

人，先后袭沈阳中卫指挥。曹雪芹上世“祖籍襄平”（辽阳）“世居沈阳”，长安寺碑也是一个重要的实物证据。后金天聪四年《大金喇嘛法师宝记》碑有曹雪芹高祖曹振彦名字，职衔为教官。天聪四年《重建玉皇庙碑记》又有曹振彦名字，列在“致政”的行列内。据这两块碑刻，可以考知曹振彦在天聪年间隶属佟养性，是汉军即乌金超哈的成员，并在辽沈地区确有活动。这两件有曹振彦题名的碑刻，对于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和祖籍等问题，都是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 ① 吴汝康：《辽宁凌平人类上臂骨化石》，《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1961年4期。
- ② 金牛山联合发掘队：《辽宁营口市金牛山旧石器文化的研究》，《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6卷2期。庙后山1978年发掘，材料在整理中。
- ③ 鸽子洞发掘队：《辽宁鸽子洞旧石器遗址发掘报告》，《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3卷12期。
- ④ 辽宁省博物馆：《凌源百八间房旧石器时代文化地点》，《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第11卷2期。
- ⑤ 许明纲：《旅大市的三处新石器时代遗址》，《考古》1959年11期。
安志敏：《记旅大市的两处贝丘遗址》，《考古》1962年2期。
旅顺博物馆：《旅大市长海县新石器时代贝丘遗址调查》，《考古》1962年7期。
- ⑥ 旅顺博物馆等：《辽宁长海县发掘报告》（未刊稿）。
- ⑦ 沈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沈阳市新乐遗址试掘报告》，《考古学报》1978年4期。
- ⑧ 新民堡遗址发掘材料见《考古通讯》1958年1期。
- ⑨ 吕遵谔：《内蒙林西考古调查》，《考古学报》1960年1期。
- ⑩ 内蒙文物工作组：《昭乌达盟巴林左旗细石器文化遗址》，《考古学报》1959年2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工作队：《内蒙古巴林左旗富河沟门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64年1期。
- ⑪ 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放汉旗小河沿三种原始文化的发现》，《文物》1977年12期。
- ⑫ 同⑪，又见内蒙古自治区昭乌达盟文物工作站：《内蒙古昭乌达盟石羊石虎山新石器时代墓葬》，《考古》1963年10期。
- ⑬ 《凌源青铜器群出土地点发现新石器时代遗址》，《文物参考资料》1957年3期。
- ⑭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内蒙古发掘队：《内蒙古赤峰药王庙、夏家店遗址试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
- ⑮ 辽宁省文物干部培训班：《辽宁北票县丰下遗址1972年春发掘简报》，《考古》1976年3期。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辽宁工作队：《放汉旗大甸子遗址1974年试掘简报》，《考古》1975年2期。
- ⑯ 热河省博物馆筹备组：《热河凌源县海岛营子村发现的古代青铜器》，《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8期。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发现殷代青铜器》，《考古》1973年4期。《辽宁喀左县北洞村出土的殷周青铜器》，《考古》1974年6期。《辽宁省喀左县山湾子出土商周青铜器》，《文物》1977年12期。克什克腾旗文化馆：《辽宁克什克腾旗元宝山发现商代铜器》，《考古》1977年5期。
- ⑰ 唐兰：《从河南郑的州出土商代前期青铜器谈起》《文物》1973年7期。晏琬：《北京、辽宁出土铜器与周初的燕》，《考古》1975年5期。
- ⑱ 《中国古青铜器选》图26。
- ⑲ 陈梦家：《西周铜器断代》（三），《考古学报》1956年1期。
- ⑳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工作队：《辽宁朝阳县魏营子西周墓和古遗址》，《考古》1977年5期806页。北京市文物管理处：《北京地区的又一重要考古收获》，《考古》1976年4期。
- ㉑ 同⑰顺山屯遗址1971年铁岭地区发掘
- ㉒ 同⑱，
- ㉓ 辽宁省博物馆文物队：《辽宁林西县大井古铜矿试掘》（未刊）。
- ㉔ 朱贵：《辽宁朝阳十二台营子青铜短剑墓》，《考古学报》1960年1期；锦州市博物馆：《辽宁锦西乌金塘东周墓调查记》，《考古》1960年5期；沈阳市博物馆《沈阳郑家洼子的两座青铜时代墓葬》，《考古学报》1975年1期；辽宁省博物馆等：《辽宁喀左南洞沟石棺墓》，《考古》1977年6期；辽阳市文物管理所：《辽阳二道河子石棺墓》，《考古》1977年5期。旅顺博物馆：《旅顺口区后牧城驿战国墓清理》，《考古》1960年8期。